

乔迈报告文学选

——乔迈报告文学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乔迈报告文学选

乔迈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 25印张 2插页 434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0649-6/1·420 定价：8.00元

作者小传

乔迈，1943年生，196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劳动模范。1977年开始写报告文学，其成名作报告文学《三门李轶闻》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根据该作改编并摄制的电影《不该发生的故事》，获《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影协金鸡奖和文化部优秀奖，并获长影最佳编剧奖（作者系编剧之一）。报告文学《希望在燃烧》，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目 录

“古兰丹姆”爱上了“乌斯满”	(1)
三门李轶闻	(21)
骆驼祥子的脚	
——记特级教师吕志范	(49)
光，向远方飞逝	(57)
闻鸡起舞者	
——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	(76)
希望在燃烧	
——运城地区端正党风见闻	(100)
黄宗英在蛇口	(154)
应该发生的故事	(178)
我欲乘风飞去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礼赞	(211)
蚕山二尼	(221)
失去了，永不再有	(241)
鱼是怎样跃过龙门的	(289)
防爆厂的“爆破性”试验	(326)
红光照亮田野	(354)
歧路芬芳	(368)
漠河大火记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灾（正篇）	(401)
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467)
卢老板余话	(626)

“古兰丹姆”爱上了“乌斯满”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边有一个凶恶狡诈的特务头子兼土匪司令——乌斯满。在一万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里边，得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烦透了他。余下的那一个，很荣幸，就是本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本主人公是这样的喜爱乌斯满，以至在他刚刚年方二八的时候，就以这位凶神的名字作了自己的绰号。后来，在他“事业”的鼎盛时期，他竟又把自己那支无法无天的队伍——多达三百余人的一群乌合之众——命名为“乌斯满集团”。

在“乌斯满”可怕的经历中，曾有过多少这样惊人的记载：

啸聚通化玉皇山。他率领自己的喽罗，三拳两脚制伏了称霸玉皇山的“马司令”，并且迫使这个流氓头子的麾下和全通化市大小流氓望风拜倒，对他“称臣纳贡”。

大闹扶余城。由于他的大驾光临，扶余县的公安民警大批出动，沿街设卡，如临大敌，想缉拿他归案。而他却带着狡黠的笑，在夜暮中轻轻走脱了。

他五进五出公安局。在戒备森严的拘留所里，在荷枪实弹的看守员眼皮底下，他竟能象克雷洛夫童话里边那只隐形的猫似地越墙而去还能越墙而归。

他骂过街道干部，打过工人民兵，斗过警察，蹯过解放

军……

他大哭、大笑、大悲、大闹，他绝食过，自杀过，他把聚众斗殴当作盛大的节日，他把捣乱破坏视为人生快事，他……

这样的—个“乌斯满”，有谁能够想到，竟会被一位美丽、纯洁得有如古兰丹姆（当然是那位真古兰丹姆）那样的少女爱上了，并且在她纤细、柔弱的手指和温存的目光下面，变得服服贴贴、唯命是从，最后竟成了一个少有的奉公守法的工人和一个赫赫大厂——长春新华印刷厂的年度先进生产者！当本文作者在初夏一个炎热的正午去采访他的时候，这位前流氓头子正满身油污、一脸汗渍地沉迷在工作里，据说，他正同时在搞两项技术革新，还当上了生产班长呢。

你看怪也不怪？

“古兰丹姆”初识“乌斯满”

究竟大名鼎鼎的“乌斯满”怎样被一个纤弱的姑娘所降伏，我们需要慢慢讲来。这里，先介绍一下这位姑娘本人。

她的真名实姓叫侯伟。“古兰丹姆”是她结识了她那横行不法的情人以后，由那位“山大王”的“小兄弟”们送给她的称呼。他们大约觉得自己这位尊嫂的容貌和秉性，颇似那部电影里边爱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美丽少女，因此就顺口胡叫起来，而不问古兰丹姆和乌斯满如何地誓不两立。

侯伟本人既年轻貌美，她的家庭又相当优越。她的父亲是H学院的教务处主任，并且曾经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她

的母亲是D局的一名干部。她是这个家庭里边的一颗明珠。她若想找对象，不是吹的，知识分子里边，至少得是个正牌大学毕业生；干部里头，顶顶得是个科长；要找当兵的，起码要正连级才配得上。说啥也不能看上个流氓，何况还是个头子！用她妈妈的话说：八亿人都挑完了，也轮不上你！

但是，生活可不是数学公式，复杂着呢。当那两位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得意洋洋地为女儿计算“ $X + Y$ ”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等号那边出现的竟全然不是他们意念中的“ Z ”。他们万分地惊讶了，其程度比听到中央又出现一次路线斗争还要强烈十倍。唉，这年头，当父母的可操心了。他们紧急磋商、周密研究之后，决定找女儿谈话了。两个人正襟危坐，一个人站在桌角。

问：小伟，你处朋友啦？

答：（开始摆弄小辫儿）嗯。

问：那个人，是个流氓？

答：（啪！小辫扔到了后面）嗯。

问：你自个同意的？

答：（抬起眼睛，正视着父母）嗯。

这三声“嗯”，就是三颗炸弹，震得小屋嗡嗡响，震得那二老眼前金星乱进，面无人色。一个泪如雨下了，一个呆坐在椅子上无言以对。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一向寡言少语、温顺得象一头小羊似的弱女儿会有这样的勇敢精神，自作主张办出了这种事！天哪，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呢！

这是1972年冬天的事。中学毕业生侯伟常到她的同学鲁琴生家里去玩。她听说鲁琴生有位叫“乌斯满”的哥哥。姑娘们都是好奇的。那哥哥的疯狂的“业绩”早就触动了她的

好奇心。

这一天，天上飘着柔软的小雪花，没有风，是冬天里的一个暖和日子。侯伟来到鲁琴生家门口，看到小胡同里有一个青年抡圆了板斧在劈样子。大冬天，他只穿一件薄薄的线衣，极发达的肱二头肌和胸大肌高高地隆起着，虽然脸色雪一样苍白，两只眼睛却出奇的明亮。这一瞬间，她觉得眼前这个人是个大力士，有点象她在父母藏书里边看到过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这时候，一位穿得很厚的老太太出来了，只见她脸上的皱纹都在笑，一面唠叨着：“够烧了，够烧了！你这孩子，刚回家就帮大娘劈柴火，一会儿就在我这儿吃饭。”说着就往下抢板斧。那青年不松手，一面说：“再劈点，再劈点，往后不知啥时候才有空。”说着，板斧又抡圆了。这一瞬间，侯伟又感到眼前这人倒挺热心帮助人。

她正自浮想联翩，鲁琴生出来了，拉着她的手往屋里走，又回头喊一声：“哥，我同学来啦。”这一瞬间，侯伟明白了，原来这位大力士，就是声名狼藉的“乌斯满”。但她怎么也不能把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形象统一起来。她感到脑子里边云腾雾绕，浑沌一片。

那当哥哥的似乎很注重礼节，听到妹妹招呼，一边擦汗，一边笑着向客人点头。他的目光很坦率，但是透着一点惊奇。也许，他对这位穿草绿色军大衣、戴着口罩的漂亮姑娘感到陌生吧，他和她都保持着庄严的神情，不失身份地谈了几句话。然后，那青年继续做活，两个姑娘进得屋来，开始低声谈起小女儿们没完没了的悄悄话了，有时还无缘无故地嘎嘎大笑起来。

虽然和女友说笑得很畅快，但是出来以后，侯伟忽然感

到心里闷闷的。她使劲想，也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令人不快的事。不过，此后她来找女友玩的次数越来越频了。

心理学家在研究人类相互关系的时候，很重视所谓第一直感，认为最初印象极端重要，在一半以上的情况下，将会决定以后的认识方向。性爱专家们在把这一研究成果运用到婚姻恋爱问题上之后，认定该理论无比正确，并把以这种方式促成的结合称之为“一见钟情”式。多少年以前，我国某些青年刊物非正式地批判过这种恋爱方式，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无产阶级的好儿女不屑为之。这样批判的时候，侯伟年岁还小，她可能没有读过那些大作，又因为正是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已经失去了固有的章法，她也就不管什么“式”，什么“范畴”，一往情深地恋爱上了。但是，姑娘的心悬在半天空里，好久好久没有着落。因为那一方面无动于衷。“人人都说咱们俩好，一头失了火一头赛冰雹”这两句民歌唱的就是他们当时的情景。这是为什么呢？“乌斯满”有心但不敢想。原来，大凡不走正道的人，虽然有时表面也雄赳赳，内心却极惴惴。尤其同正派人站到一块的时候，自卑感就会笼罩了他们的全灵魂。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他们才会自惭形秽，他们身心中健康的因子才会占上风，他们才会产生上进和学好的愿望。“乌斯满”这时候就对自己的坏名声，感到非常不安。他很留意观察姑娘的眼光，生怕在那里会出现任何厌恶的表示。他缺少勇气把那句话说出来。他被自己的处境折磨得又痛苦又难堪。他开始失眠了。有一回，他听到姑娘似有意若无意地说了句：“流氓也不都一样，得分啥流氓。”他听了心里一动。可他哪里知道，说这话的时候，侯伟已经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姑

娘的心可不是轻易就能给人的。她了解到，自己的意中人最喜爱的是聚众斗殴，俗云“打群架”，但他从来不沾男女关系的边。这是一个姑娘在选对象时候最注意的一条。他还非常反对任何对妇女的不轨行为。他说：“我不干那种事。我也有个妹妹。”这句话使侯伟大受感动，甚至在她美丽异常的大眼睛中还聚起了一汪水。因此，当她那气昏了头的父亲操起自行车打气筒，没头没脑地向她砸过来，她的妈妈也一边哭一边数叨的时候，她还只管说：“我啥也不图希，就图希他的心，图希他能对我好，能对得起我。”唉！一个姑娘要求于她爱人的多么多又多么少呀！

但是，那个被她给予了黄金般的身心、白雪样的声名的人，配接受她的爱情吗？

“真神”在微笑

“乌斯满”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但是，他也并非如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边一蹦出来就会翻斤斗、闹天宫。左邻右舍，甚至居民委员会干部都承认，他在一小的时候很知书明礼，尊敬长辈。他身上唯一不安定的因素是喜欢练拳脚，为的是使胸大肌和肱二头肌高高隆起来，没怎么考虑要派其他的用场。

但是时势造英雄呀！他刚刚辞别了少年时代，就欣逢一场把青少年捧上了天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那场“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只须动手，勿庸动脑。能捣乱破坏就是好家伙，能打仗就更好，这可就给了精通拳脚的小青年们以绝妙的良机。“乌斯满”一下子成了吉林省交通运输学校造反派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这位不久以前还在长春第四

十二中学担任着班长职务的守纪律的学生，此时象喝足了王母娘娘的蟠桃酒似的，迷迷糊糊了，觉得这可真挺好，又拿着助学金，又不用上课，又没有人管束，斗校长也行，批老师也行，砸碎玻璃听响也行，学着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把校园里的小树当作“修正主义苗子”通通拔掉也行。学校里边玩腻了又可以“大震军威杀向社会”。

但是社会可比不得学校。瓜子里面嗑出个臭虫来——啥仁（人）都有。于是有人怂恿他去跟“马司令”斗。斗败了“马司令”，可就有人请客了。一品斋，西餐馆，菜谱上边写着的全上。整个一层楼都包下来了。也不知道哪来的钱。喝得醉眼也斜了。啪！一打票子放手里了。“兄弟，拿着零花，看个电影，买根冰棍啥的。学生哪来的钱！以后哥哥有用着你的地方呢。”他大受教育了。从此，不再吃学校里十三大元一月的伙食。帮别人打架，别人也帮自己打架。打别人也被别人打。气死公安，难死法院，急死了老师和家长。蹲小号才光荣呢，没戴过“手铐子”算什么好汉！什么祖国的前途，青年的理想，人生的意义，什么美和丑，正确与错误，光荣与耻辱，什么高尚的品德，优美的情操，没有那个玩艺儿。至于文化和知识，一边凉快去吧！鲁迅是哪国人？日本人吧。五除以五，得几，得零呗。你看，我们哥五个分吃五块烧饼，不是一吃就光了吗？咳咳，这真是产生混世魔王的年代。青少年们不知道人生这样复杂，情犹可恕。可恨的是那帮新式权贵，专以捏塑这样的畸形儿为能事，还腆着脸夸耀于全世界，说他们培养了最红最红的革命接班人呢。更可悲的是，这帮大人物们折腾够了，矫正的任务却要由社会、教师、家长，甚至弱女子来承担。自从猴子变成人以来，可

有这样的公理！

不管怎么说，侯伟勇敢地承担了这个矫正任务。她相信自己比公安局和法院更了解那个不法的人，她相信自己的力量。“我能叫他改。”她平静地说。于是，他们结婚了。

“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她的“利器”就是一颗心。

“药顽疾者，须用灵药”，她的“灵药”就是爱。她会取得成功吗？路远着呢。当她只穿着随身衣服，走出那个疼她爱她娇她惯她的娘家，来到她爱人那间空荡荡的小屋时，她哪里知道，前面等着她的，会是一连串丢脸的失败和无穷的痛苦呢。

“大风吹倒梧桐树，也要他人论短长。”他们的婚姻没有得到社会普遍的同情，遭来的倒是蔑视和冷眼，甚至有人横加摧残。她的父亲，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给她一身青肿之后宣布断绝父女关系，追回了手表和自行车，取消了为她安排好的工作，严禁她的母亲给女儿任何经济上的接济，不许家人和她往来。街道上的工人民兵小分队、即俗称“棒子队”的，出于不可理解的原因，常常成群结队或者不成群结队地到他家去“查户口”。白天查，晚上也查。一个月要查夜二十次。半夜里，咚咚咚！敲门声象报警似的响起来了。雪亮的四节大手电光专在女主人身上扫来扫去。

这些还都可以忍受，最叫人伤心的是她的爱人不争气。这时候，他已经到新华印刷厂当了工人。他也真诚地保证要学好，还宣布解散了以他的绰号命名的那个“乌斯满集团”，断绝了和“小兄弟”们的接触，在厂里他还早去晚归，又参加轮夜班。但是他上夜班的时候，家里“查户口”就更紧，常使他那个强捺着的凶暴脾气发作起来。侯伟到处找工作，

到处找不到工作。一家人撑门户过日子，单靠作丈夫的那四十四元工资，“乌斯满”又大手大脚惯了，所以常常弄得他们狼狽不堪。不久又有了一个儿子。年轻的母亲不懂得坐月子不能生气上火道理，闹得一滴奶水皆无，只好每天订五瓶牛奶，星期天另买私人的二斤羊奶，小两口数着“硬蹦儿”过日子，也过不下来。侯伟想到了向组织上求助这条路，她听丈夫讲过，车间有个女主任，象个老大姐姐。但是“乌斯满”不敢去，他还被强烈的自卑感控制着，怕碰钉子，这就只好苦熬硬撑着。

被解散了的前“乌斯满集团”的有些分子听到信了，于是奔走相告，一个个欣欣然面有喜色，觉得是“搭救”他们前头目的好机会，“把大哥接回来，请他出山，领头再干。”一群人就相约着轮番去送米送面，送鱼送蛋，送活鱼和对虾，送胖狗和肥鸭，还送成打的钱，成捆的布。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古兰丹姆”大嫂子不怎么领情。以前，他们缩头缩脑地来看“大哥”的时候，本来见惯了她冷若冰霜的面孔，这一回她更把那双美丽异常的大眼睛瞪圆了，还让它们放出逼人的光。那些嬉嬉笑着的“兄弟”一碰到这光，立刻不敢再笑嘻嘻，而且一齐往后退，生怕一步退迟了，那些从窗口乱扔出来的礼物，就会砸得他们头破血流。侯伟做得这样绝，不仅让所有那些恭敬地喊她“大嫂”的“兄弟”们下不了台，也不给她的丈夫留一丁点儿台阶。她那以温存为特征的“利器”和“灵药”，此时完全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她真可称得上是刚柔兼济的大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包括她的亲人在内，能够从旁助她一臂之力，那末，她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谁肯这么

做。更有落石下井者，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神圣使命的工人民兵小分队，趁此时机，又大抓起阶级斗争来了，还煞有介事地成立了“民兵专案组”，专在夜半以后，用四节大手电筒的光柱在女主人身上扫来扫去办专案。

走投无路的“乌斯满”象落到陷阱里的一头受伤的狮子似的发出了怒吼。但这怒吼很快地就在他妻子纤细、柔弱的手指和温存的目光下边窒息了。他不能不顺从她的旨意。

“乌斯满”深深地后悔了。他抡起拳头狠打自己的脑袋，用最难听的话喊着自己的名字痛骂不休。他把自己叫作“混蛋”、“坏蛋”、“天底下头号没良心”，怎么就不叫“老警”“摘了瓢”去。而这些罪名的后边只是因为他觉得不该恋爱，不该结婚，尤其不该有孩子。没有孩子还可以离婚，而现在……。他仰天长啸：“我该死！我该杀！我连累了我这么好的爱人，她太好了，我不配承受她！我不能再让她跟我遭罪。”他大哭一场之后，沉静下来了。他决定动员他的三百名弟兄，让他们帮自己大干一场，捞一大笔钱，够他爱人带着孩子花一辈子的，然后自杀。

他开始秘密召集兵马了。同时对待妻子加倍地温柔和体贴。侯伟望着丈夫镇定的神态，感到很宽慰，就转过身去，安宁地睡了。

而在风雪弥漫的大冰山的那边，凶暴的“真神”——乌斯满的幽灵，正带着阴险的笑，注视着他的崇拜者，他很高兴，因为他看得出来，自己那些最卓越的“美德”，又回到这个可爱的青年身上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脏钱冷酒，终究是病。

“乌斯满”把整个社会——除他爱人之外——当敌人。这样的世界观，使他看不清自己的出路。他认为社会亏待了他，却不考虑他怎样危害了社会。因此他就疯狂地报复！报复，是一切流氓分子在绝望之际，普遍喜欢使用的杀手锏。“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是这种人物的“英雄”格言。而我们有缺点的社会，常常帮助了这一格言的施行。

但法律到底比流氓分子更强大。“乌斯满”接连入狱了。最长的一次达一年零三个月。他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因此，曾经被人用伴有呼啸之声的大棒子进行“帮助”，又被人拿细铜丝绑上大拇指来“提高认识”。

在长春市郊区八里堡收容站，他终于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希望以此来斩断他和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缕联系。得到的回音是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夏天的毒太阳下面、一个抱孩子、挎小包袱的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的妇女前来找他。当时他正在外边光着膀子搬大石头铺路。远远地，他看见胡管教在和—一个妇女谈话。又见胡管教走过来了，命令他放下石头，又狠狠地瞪他一眼。他以为这位平素还算和气的管教抓住了什么错处要揍他。于是垂手站定，使全身的神经紧张起来，准备接受一次对肉体的惩罚。惩罚没有降临，却听到了一句使他终生难忘的话，那种语气是只有从恨铁不成钢的母亲或长兄的口里才能发出来的：“去看看她吧，你这个——！”

“乌斯满”打了一个寒战，觉得比受到一万次拳打脚踢还要痛苦百倍，胡管教催他：“愣什么，快去呀！”他迟疑

着，使出全身的力气挪动脚步，好象工地上的全部石头都捆到了腿上。他们终于面对面站到一起了。他看到妻子浑身汗湿，双目红肿，昔日清秀端庄的脸上只有泪水在冲刷着灰尘。他无地自容了，多少时候以来费心恢复起来的铁石心肠象冰山一样地崩塌了。他们面对面站着，泪眼相视，无言对泣。倒是妻子首先镇定下来，对他说，她跟管教谈了，管教说，只要他不再抵制，把问题原原本本交代出来，就放他出去。

果然，当天下午，胡管教就找他谈话。他如实交代，一次结案。第二天，他的妻子带着钱、粮票来，付清了伙食帐，接他回家了。

我们这一对苦鸳鸯的艰难的人生旅途可没有临时结束。既然党和国家在危难中，她的儿女们——无论是优秀的还是不怎么优秀的甚至不肖的——就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出路。

1975年春天，大“理论家”张春桥代表他的“左”派集团提出了新的阶级斗争理论，这理论的重要一项发明就是给“教唆犯”这个名词赋以政治内涵。早已对理论和政治不感兴趣的“乌斯满”忽然成了这个樊笼里边的鸟儿。这年夏天，基本上没有再犯罪行的他忽然被冠以“教唆犯”的罪名逮进公安机关。预审的时候提出了罪证，那就是他常喜爱哼“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黄色歌曲”。还有，在“乌斯满集团”没被解散以前，他作为“大哥”，偶尔教过他的“兄弟”们练习拳脚。这就分明是“政治教唆犯”。刑事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高于一切，政治正在大搏斗，你死我活，决不能手软。因此，这一次结案很快。他得到暗示，将对他判刑而不只是拘留了事。

被囚禁的“乌斯满”很惊异，他不习惯从大局着眼。他